

# 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彭丰文

**【提要】** 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创新、转型升级的自身需要,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时代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扎根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吸收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学术成就与学科建设经验,突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性、原创性、独立性、民族性,彰显中华文化本位意识,开创中华民族史研究新局面。

**【关键词】** 中华民族史 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厚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创造了绵延不断、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演进脉络和特点。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不断增强交往交流交融、发展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积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sup>①</sup> 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创新、转型升级的自身需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时代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前,部分学者已经就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或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sup>②</sup> 但是,总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需要汇聚更多研究力量,展开持续深入的探索和交流。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展开探讨,旨在抛砖引玉,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校正。

## 一、什么是“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明确其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智库研究项目“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项目编号:23ZKJC025)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

② 参见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马戎:《如何思考和理解中华民族史》,《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马戎:《如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杨筑慧、苍铭:《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光明日报》2024年1月24日;刘正寅:《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人民日报》2024年3月25日。

基本内涵,并对中华民族史的学术定位,如学科归属、主要内容、学术取向及其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关系等方面作出明确界定。

### (一)基本概念

“自主知识体系”是指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根基的具有文化独立性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涵是“自主”,其本质属性是文化主体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本土性、独立性和民族性,即对本土原创的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维护、传承和发扬。<sup>①</sup>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提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②</sup>这一论述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民族史是一门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和民族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它既属于一级学科中国史的研究范畴,又属于一级学科民族学的研究范畴。当前,在中国史学科中,中华民族史属于二级学科专门史下设的“民族史”研究方向;在民族学学科中,中华民族史融汇在二级学科中华民族学下设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两个研究方向中。因此,在历史学、民族学教学科研机构的学科设置中,均包含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民族历史文化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演进脉络和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自成体系的鲜明特点,决定了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提出,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紧密交融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不可分离,凝聚成牢固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实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离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的探讨,无法深入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机制,更无法分析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

### (二)研究内容与学术取向

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为中心任务,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基础问题,着重考察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梳理各民族汇聚融合、由多元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揭示各民族共同性不断增强的历史趋势,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源泉,如正统观、“大一统”思想,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凸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在中外比较的学术视野中,探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

<sup>①</sup> 参见刘建军、张丹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求》,《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刘曙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sup>②</sup>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在世界文明史领域中的意义,探讨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华民族史研究与中国民族史学科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中国民族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百余年学科发展历史。二者在研究对象、内容、宗旨、原则等方面交叉重叠,均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中国民族史学科为中华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提供了学科建设经验。中华民族史研究是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创新,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转型升级,是中国民族史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新阶段、新面貌。二者一脉相承。

中华民族史研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创新,主要体现为学科取向的转型与突破,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史研究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突出体现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性和一体化趋势,突破中国民族史学科长期以来偏重于研究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局限。二是中华民族史研究从大历史观的理论视角出发,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历史趋势、内在动力机制及其与中华文明史内在联系等宏观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突破中国民族史学科长期以来理论研究薄弱、碎片化研究现象较为普遍的问题。三是突出强调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中华民族整体史观、发展史观、多元一体辩证史观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客观理性对待海外学术思潮,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史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突出中华文明主体性、自觉性和中华文化本位意识。

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比较薄弱,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多。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尤中所著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sup>①</sup>但是,它们总体上仍然停留在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局限之中,在理论方面尚有诸多缺憾。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启动了《中国通史》编纂工程《中华民族史》卷的编纂工作,该卷由杨圣敏、王希隆担任主编,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那么,应当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呢?以下拟从文化根基、学术基础、总体思路等三个方面略陈管见。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深厚,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扎根中华文明土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两个方面尤为重要。

### (一) 中华传统史学精神与家国情怀

中华文明蕴含浓厚的历史意识,形成了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为中国传统史学赋予了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形成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史官制度,以史官记录国家大事和君王得失,对君王形成政治、道德约束,引导和规范国家政治生活和君王政治生活行为,其中孕育了尊崇历史书写、

<sup>①</sup> 萧君和主编:《中华民族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晨光出版社2007年版。

以史为鉴的政治文化意识。春秋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该书据传是由孔子编修而成。《春秋》微言大义,将政治主张寓于历史书写之中,为史学赋予警示、借鉴和引导、规范统治阶层政治行为的功能,使得这部著作在后世逐渐具有经、史合一的性质,被赋予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孟子认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①</sup>这是对《春秋》现实政治功能的生动概括。《春秋》经史合一的写作风格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广泛传播,使得历史意识渗透到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独特鲜明且历久弥新的传统,孕育了中国传统历史学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思想渊源。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将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叙述自己不畏艰辛编纂《史记》的目的,乃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sup>②</sup>其中蕴含通过历史考察的方式探究和解释现实的意涵。司马光与宋英宗、宋神宗两代君臣编纂《资治通鉴》,亦是出于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目的。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文中表示,“《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意为《诗经》等儒家经典均有历史鉴戒功能,可以为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提供参考借鉴。他对《资治通鉴》书名由来作出明确解释,即发挥历史的资政借鉴功能,为现实服务,其文曰:“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sup>③</sup>

可见,以史为鉴、关怀现实是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共识,是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历代王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特别是儒学士人均对修史抱以巨大的热诚,官修史书被赋予治国理政、鉴远知来的神圣使命,成为承载时人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由此,形成了历代王朝为前朝编撰史书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纲要的中华民族历史的系统记载,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增强中华文明连续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确立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宗旨、目标、方向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 (二)“大一统”思想

中华文明蕴含鲜明的“大一统”思想,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特点,形成了尊崇和追求“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大一统”概念形成于春秋时期,源自公羊派儒家学者对《春秋》“王正月”一句所作的阐释。其文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sup>④</sup>其中蕴含王权独尊、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凸显了对政治和疆域一统的追求。西汉时期,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sup>⑤</sup>把“大一统”视为政治不二法则,赋予其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此后,“大一统”思想逐渐成为历代王朝共同遵奉的政治思想,尊崇和追求“大一统”政治格局成为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和突出特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源泉。李大龙等指出,“‘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是推动多民族国

①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6《滕文公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5页。  
② 《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③ 《资治通鉴序(御制)》,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4页。  
④ 《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页。  
⑤ 《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23页。

家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实际上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钥匙”。<sup>①</sup>

中华文明具有包容“五方之民”的广阔胸怀，形成了将多元的民族文化融汇于一体的思想传统。《礼记》记述了“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的观点，<sup>②</sup>表达了各族求同存异、统一于天下的政治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朴素的多元一体意识。《史记》传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以大量具体细微的历史书写，深刻体现和发展了“大一统”思想与朴素的多元一体意识。《史记》开创性地描述了中华民族早期从多元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政治历程，表达了各族“同源共祖”、俱为兄弟和天下共为一家历史文化观念。例如，《史记》勾勒了上古时期以黄帝为始祖的庞大谱系，认为吴、楚、越、匈奴、百越、西南夷等周边少数民族群均是黄帝后裔，与中原华夏民族是同源共祖的兄弟，“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sup>③</sup>“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sup>④</sup>同时，《史记》设立《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边疆族群专属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四夷”立传的先河，系统梳理了先秦至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群的形成发展历史及其相互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对边疆少数民族群倾注兄弟手足之情，给予尊重和包容，并借历史人物司马相如之笔，表达了期待“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愿景。<sup>⑤</sup>这是“大一统”思想的集中体现。随着儒学的发展，“大一统”思想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政治文化共识，成为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传统。

总之，中华文明蕴含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传统史学精神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为中国传统史学赋予强烈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同时蕴含突出的“大一统”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重视书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史的基调与底色，形成了重视多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书写传统和崇尚多民族和谐共生、天下一家的政治文化取向，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连续性。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

### 三、中国民族史学科百余年探索的成就与经验

中华民族史研究是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创新和转型升级，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学术联系。学术发展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和脉络，学术创新离不开已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积淀。中国民族史学科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和启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遵循学术的内在逻辑与脉络，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百余年形成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从中吸收有益的学术成果和历史经验，将其转化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资源。

① 李大龙、王珏：《“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  
② 王文锦：《礼记译解·王制第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6页。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79页。  
④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75页。  
⑤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51页。

### (一) 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形成历程与成就

中国民族史学科与中国传统史学有着密切深厚的联系。“二十四史”中有“四夷传”,还有其他形式的历史文献,如地方志、个人游记、碑刻,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形塑了中国传统史学对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范式,为现代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

中国民族史学科是西方近现代的政治文化理念、高等教育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影响中国的产物,是“西学东渐”的结果。20世纪初,是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孕育时期。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提出“史学革命”的主张,倡导以进化论为工具,以民族主义为宗旨,冲破中国传统史学的桎梏,开创“新史学”,<sup>①</sup>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学术的转型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6年,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对先秦时期中国民族构成与源流进行简要分析,标志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端。<sup>②</sup>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先秦时期中国民族问题展开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紧密交融混合的观点。<sup>③</sup>此后,更多学者加入中国民族史研究队伍。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学术演讲、在高校开设中国历史或中国民族史等相关课程、编撰和出版中国民族史教材,直接推动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光华大学吕思勉、北京师范大学王桐龄、厦门大学林惠祥纷纷在任教的大学开设中国民族史课程,并出版多部《中国民族史》,<sup>④</sup>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标志着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正式诞生。由此,中国民族史学科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陆续推出系列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迈入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的新阶段,获得空前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史学科蓬勃发展,在学科理论、学术成果、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面貌。<sup>⑤</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动下,中国民族史学科进入新阶段,开启了向中华民族史研究转型升级的新征程。

中国民族史学科在百余年的探索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sup>⑥</sup>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学科理论方面,形成了中华民族由各民族融合形成的学术共识,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凝聚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学术取向,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是在研究成果方面,推出了一批综合性民族史专著,如中国民族通史、区域民族通史、古代少数民族族别通史和55个少数民族简史。这些研究成果从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空间维度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实证研究的主体框架。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在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显著推进,形成了大批专题性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民族关系、民族政治与文化、民族心理认同等领域成果丰硕,丰富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内容。

四是在研究资料方面,民族语言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突出成就。大量西夏文、契丹文、满

① 梁启超:《新史学》(1902),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753页。

②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6),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419—3434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435—3451页。

④ 参见史金波、关志国:《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5、395页。

⑤ 参见彭丰文:《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成就、经验与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⑥ 参见王延中主编:《新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4—340页。

文、蒙文、察合台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语言资料得到发掘整理,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和多元的研究视角。

## (二)中国民族史学科百年探索的经验与特色

中国民族史学科百余年探索历程,积累了系列重要历史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与学术传统,值得深入总结思考和参考借鉴。

第一,中国民族史学科形成了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本土、坚守中华文化本位、独立探索的道路。中国民族史学科既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在形成发展道路中,中国民族史学科并不是对西方民族史学科简单照搬照抄、全盘复制,也不是固步自封,困守传统,而是对传统与现代、对中西文化保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独立思考、为“我”所用的学术取向,这是中国民族史学科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民族史学科孕育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关键节点上,这一特点得到尤为突出的体现。

20 世纪之初,梁启超掀起的“新史学”思潮虽然高举“史学革命”的旗帜,对中国传统史学开展反思和批判,倡导以西方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思想重释中国历史,但是“新史学”提出的内在精神动力,却是源自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文中所言:“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sup>①</sup>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的目的是以史学为“国民之明镜”和“爱国心之源泉”,即发挥史学的鉴今功能,增强中国的国家凝聚力,使中国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拳拳爱国之心的生动体现,是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家国情怀的生动再现。可见,“新史学”的精神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赋予的内在灵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术领域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华文化本位的突出体现。同时,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倡导,可以理解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技术”层面的革新,体现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和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民族学界老一辈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突破苏联民族理论教条的束缚,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深受苏联影响,民族“四要素论”和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论断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和民族工作实践中具有权威地位,产生广泛影响。然而,部分学者在历史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中发现,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从而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轮学术讨论热潮。1956 年,费孝通、林耀华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少数民族识别的研究》,既肯定“四要素论”的积极意义,又反对简单照搬苏联对“民族”的定义,认为应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sup>②</sup> 对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论断,部分学者以讨论汉民族形成时间为契机,以具体可靠的史实给予了质疑和否定。例如,范文澜认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sup>③</sup>牙含章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民族经由古代的部族发展

① 梁启超:《新史学》(1905),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736 页。

② 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 60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 页。

③ 参见范文澜:《试论中国从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 年第 4 期。

而成,“这说明民族在资本主义以前早已存在”。<sup>①</sup>他进而指出,汉族在夏代就已经形成了。他说:“根据我国史料来看,我国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古代的希腊民族、罗马民族及日耳曼民族的形成经过同样的过程,即先有部落结成部落联盟,然后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为汉民族的。”“从秦汉以前汉族自称‘诸夏之族’这一名称推断,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汉民族的形成时代如果从夏代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了四千余年的历史。”<sup>②</sup>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所构建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理论,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并逐渐成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普遍共识。”<sup>③</sup>中国学术界突破了苏联民族理论教条,反映了老一辈学者独立思考、拒绝盲从、不畏权威、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体现了立足中国本土、坚守中华文化本位、独立探索、为“我”所用的学术取向,开启了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的历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方向,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和精神激励。

第二,在中国民族史学科百余年的探索历程中,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性、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注一以贯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一脉相承,成为中国民族史学科最为突出的学术共识和学术传统。这是中国民族史百年探索的最突出的学术成果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转化和发展。

中国民族史学科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历史上各民族的交融性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不断推动关于中华民族整体论的理论创新。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相互交融、混合的结果,并且“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sup>④</sup>虽然他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论述,仍然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引作用。王桐龄指出,“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血缘纯粹的民族已不存在,而中国历史上各政权也都是各民族交融的“混合体”,“亦绝无单纯血统”。<sup>⑤</sup>1939年,以顾颉刚、费孝通、傅斯年、翦伯赞等著名学者展开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对各民族交融性、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得到广泛传播。<sup>⑥</sup>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从疆域、民族、文化等各个角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论阐述。白寿彝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疆域,今天中国领土的不少地区的最先开发者,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在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sup>⑦</sup>方国瑜认为,“我国国土之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

① 章鲁:《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人民日报》1962年6月14日第5版。章鲁为牙含章的笔名。

② 牙含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5页。原文载于《人民日报》1962年9月4日,题目为《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作者署名章鲁。

③ 赵永春、王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与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0页。

⑤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序”,第1—2页。

⑥ 参见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⑦ 白寿彝:《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sup>①</sup>张博泉提出“中华一体”论,<sup>②</sup>谷苞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sup>③</sup>1988年,费孝通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演讲,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共同性及各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论述,深刻揭示了历史上各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的历史事实。<sup>④</sup>在学界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下,各民族交融互动、共创中华的观点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理论得到深入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成为学界与社会的普遍共识。

回顾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百余年探索历程,其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学科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始终扎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家国情怀,坚持各民族交融性、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学术传统。二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积极吸收借鉴中外文明的有益养分,同时坚持中华民族文化本位,突出原创性、本土化、民族性的学术取向。三是拒绝盲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敢于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综上所述,经过几代学者不畏艰辛、筚路蓝缕的探索,中国民族史学科走出了一条扎根本土、特色鲜明的学术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学科建设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从而确保了中华民族史学科始终保持学术上的原创性、本土性、独立性和民族性。正因如此,中国民族史学科才能始终保持发展创新的活力,不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向中华民族史研究转型升级。中国民族史学科百余年探索历程,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 四、总体思路:传承、反思与创新

中国民族史学科经过百余年探索,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经验,又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与局限日益凸显。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海外学术思潮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开阔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思路;又引发了思维混乱,滋生了不少问题。学术研究既需要传承和发展,更需要深刻总结、反思和创新,迈向新的阶段。当前,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 (一)坚持“两个结合”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蕴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中国传统史学的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学术精神和家国情怀,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民

①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方国瑜著,林超民整理:《方国瑜文集》第1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② 张博泉:《“中华一体”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  
③ 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谷苞:《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谷苞:《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族史学科长达百余年的形成发展历程中,始终得到关注、传承和发扬,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源泉,引导和形塑了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宗旨、原则、内涵和学术取向。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要重视“第二个结合”,扎根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到中华民族史理论和具体的实证研究中。

为此,首先要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史学精神和家国情怀,把中华民族史研究放在承载国家和民族命运、关系国家民族兴衰荣辱的重要位置与理论高度,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怀作为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最高宗旨和原则,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放在学科建设的首要位置,主动肩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责任与使命。

其次,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探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作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中体现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确立鲜明的中华文化品格,凸显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交融互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政治文化特点,以中华民族史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二)反思问题与不足

中国民族史学科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学科建设经验,这些学术成就应当在中华民族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吸收。然而,中国民族史学科在形成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对此进行深刻总结与反思,是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受到海外错误学术思潮的影响较为突出,知识体系自主性不足,尤其是在基本理论与概念的使用方面出现了不少新问题。例如,有的研究成果片面强调中国历史上北方各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所谓“内亚性”“民族性”,宣扬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二元对立”关系,忽视、淡化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有的研究成果不加辨析地使用海外错误学术概念,如“内亚民族”“中国本部”等。有的研究成果用海外学术界流行的殖民理论解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略开发,以及古代边疆民族政权性质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陷入“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困境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还有的成果受到“想象的共同体”等错误学术理论的潜移默化,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出错误解读。这些错误观点,反映了海外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学界的严重影响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够健全的现状。

二是对重大基础问题、现实问题、敏感问题的理论研究不足,理论体系不够科学完备,存在较多薄弱点。例如,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民族英雄的认定、各族群首领所创政权的性质、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如何界定使用民族和族群等概念,目前的研究总体不够深入,很多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学术共识。

三是研究思路出现偏差,研究方向存在错误倾向,对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现象。一方面,不少学者将历史人物的民族身份标签化,将民族问题泛化,将所有与少数民族人物或者活动区域有关的历史事件都贴上“民族问题”的标签,把本属于政治性质、社会性质的问题认定为

民族问题,夸大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例如,对北魏六镇起义、元明和明清改朝换代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均存在将民族问题泛化、标签化的倾向。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仍然局限在中国少数民族史、“华夷”关系史研究领域,忽略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各民族交融性研究,制约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四是研究成果良莠不齐,同质化、碎片化及“短平快”“一窝蜂”的现象比较突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得到一定的关注和重视,成果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但也出现了成果良莠不齐、片面追逐热点的现象,缺乏足够的系统性、创新性和应有的学术深度。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概念理解不深不透,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有的研究成果拘泥于碎片化的史实考察,缺乏全局研究视野。

以上四个方面,在当前学术研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反思是为了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弥补不足,推动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创新和转型升级。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民族史学科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客观需要。

### (三)推动学科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民族史学科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基础,推动学科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决反对、揭批海外错误史学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视角,避免盲目崇拜海外学术成果,对海外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保持客观理性态度,既吸收借鉴其合理可取的成分,又对其研究的立场、态度、研究视角保持清醒,对错误观点要勇于从学理上进行批判,深入探讨其错误根源,正本清源,以理服人。

其次,要聚焦和深化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重大理论问题、基础问题,全面开展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重点解决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容易引发思想混乱的系列理论问题,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原创性、民族性、独立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中华文化本位。

再次,要纠正泛化、窄化和标签化等错误倾向,走出将“中国民族史”等同于“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狭窄视角,辩证分析看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避免根据历史人物民族身份“贴标签”的简单粗暴做法,正确阐释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民族的关系,把研究视野扩大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构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大历史,为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夯实历史逻辑基础。

最后,要充分收集和整理各种形态、各种民族语言文字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料,进行科学、系统分析,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此外,我们要改变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的状况,提升研究成果总体质量,鼓励学者潜心研究并推出有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纠正浮躁学术风气和功利化、庸俗化的不良倾向。

## 结 语

中华民族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脉,连接着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民族史

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史学科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是增强中华文明主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时代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延续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民族史学科百余年探索取得的学术成果和学科建设经验,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尊重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遵循传承、反思与创新的总体思路,充分吸收中国民族史学科已有的学术成果和历史经验,传承学术薪火;同时必须深刻反思和正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勇于纠正错误,弥补不足。

回顾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史为鉴、关怀现实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与家国情怀始终贯穿其中,一脉相承,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使命担当精神。“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世代相传,不断发展,推动各民族交融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统一性不断增强,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中国民族史学科扎根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学术理念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同时不畏权威,拒绝盲从,独立思考,敢于突破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几代学者不畏艰辛,筚路蓝缕,中国民族史学科走出了一条扎根本土、特色鲜明的学术道路,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鉴往知来,砥砺前行。回顾是为了更好地走好当下,展望未来。构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应当秉持以史为鉴、关怀现实、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既要扎根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动力源泉,突出中华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性、原创性、独立性、民族性,彰显中华文化本位意识,又要登高远望,开阔视野,摒弃教条主义和固步自封,从中外文明中汲取一切有益的思想养分,不断调整和丰富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勇于纠正错误倾向,加强对薄弱领域的研究,在传承、反思、创新中不断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努力开创中华民族史研究新局面。

(作者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 Peng Fengwe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discipline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of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discourses, and theories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also a response to the contemporary demand to solidify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build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carry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must take root in the deep soil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bsorb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discipline build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need to highlight the indigeneity, originality,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ity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wing the central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opening up new horiz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Goals of Borderland Studies since Modern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 Duan Jinsheng

With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modern borderland studie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change, transitioning from a traditional historical-geographical narrative to a professional and disciplinary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promoting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consistent goal of the two upsurges of modern borderland studies. This goal has been progressively reinforced during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dynastic state to a modern sovereign nation-stat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rderland studies in China have embarked on a new phase development, yielding numerous new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further developing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since the new era, borderland studies in China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promoted to construct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an academic proposition of the times.

**Pseudo-History and Hegemonic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atalog Classifications: Reflections on Liu Zhiji's Thoughts of Catalog Classifications** // Qin Li

Since Ruan Xiaoxu's *Qilu* and the *Jingji Zhi* in the *Book of Sui*, pseudo-history and hegemonic history have become important subcategories in catalog classifications.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the bibliographies of each dynasty established pseudo-history or listed hegemonic history as a category. On the one hand, the differences in naming these categori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contexts, orthodox ideologies, and academic stances of each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also subject to intertextual borrowing among bibliographies. Starting with the *Yinxi* in *Shitong*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Zhiji criticized the inclusion standards for the hegemonic history category in the *Jingji Zhi* of the *Book of Sui* and other issues. A close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when Liu Zhiji often measured these ancient books according to his personal standards and overlooked the actual conditions and styles of text compilation. In particular, he fail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ecording actual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recording the writings of the dynasty” in the catalogs. This distinction is essential when we examine Liu Zhiji's thoughts on catalog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A Review of Arnaldo Momigliano's Research on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Antiquity** // A Hui

Arnaldo Momigliano was a prominent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ancient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